

萧功秦 著

历史的眼睛



東方出版中心



历史的眼睛

萧功秦 著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1
知识分子：困境中的沉思者	14
与乌托邦理想主义告别	20
当代世俗化潮流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26
晋豫之行手记	41
北京的历史个性	60
思想碰撞在台湾	65
台湾南部旅行记	90
日本归来致友人的信	112
美国归来随想	117
追忆恩师韩儒林先生	137
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	
——怀念挚友陈文乔	142
敦煌往事	146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小学生活的回忆	150
经由历史的智慧来理解生活	157

人生经验与学术悟性 163

从清末改革谈到当代思想论争 169

思想史的魅力 184

历史的魅力在于对文明的感悟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196

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200

元蒙史随想：鲶鱼效应与民族生命力 214

走向静悄悄的革命

——从《走向共和》人物形象谈起 220

一个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变革

——与墨子刻对话之一 228

文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及其他

——与墨子刻对话之二 242

为什么要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中国不高兴》批判 260

附录 “思想者是幸福的”

——萧功秦教授访谈录 272

后记 308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

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

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多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映。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7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

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上海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吧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科学刊物!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

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像前烧几炷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著而且强烈的。“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

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毋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建国以前，是一个思想左翼的开明士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湖南一个城市的人民法院院长任上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横。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

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的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20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粱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

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情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遵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東西来遵顺,无疑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性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

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国人的人格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对于当下中国人来说,有哪些时代因素影响了我们追求丰富的富于个性的生活呢?首先,市场经济带来的人的价值观念的世俗化潮流,是一股巨大的习惯力量。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态度,它取代计划经济无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进步,但它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一种功利至上的价值观。

其次,我们以考试为本位的教育是一种充满功利化倾向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加强版”,我们的教育很少启发学生的知识审美之心。一切都环绕着分数与考试转,它的最大祸害是抑杀了对知识的由衷的兴趣。家长的压力,学校的压力,把知识兴趣抑杀了。前不久一个四川亲戚写信告诉我,他们家上初中的小孩,每个月课外补课费就要交给学校一千元,不交老师还不高兴,可以想见,这样的孩子过不了几年,他对知识的兴趣就被沉重的功利性窒息殆尽了。

我们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教育中最不重视美育的教育体系,数十年来美育的缺乏,几乎可以说形成了类似于马铃薯退化现象,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教师自己就是在这一教育制度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中许多人自己对知识都没有由衷的兴趣,怎么能让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呢?记得爱因斯坦有一篇谈科学家的人生观的文章,他说,“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一种超功利的对求知事物了解的渴望。如果这种朴质的好奇心在俗世生活中没有泯灭,而是在经历苦难中仍然保留下来,在科学家身上就发展为对宇宙秩序渴望认识的愿望。”我们大多数教育者好像从来就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一个因素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关,那就是传媒、网络文化与市场竞相结合形成的冲击波。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传媒商品化,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大众化的低俗趣味可以迎合更多人的口胃,传媒在竞争压力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这种低俗化的口胃,以获得更

大的广告收益,然而,较低趣味的大行其道,不断重复,又会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低趣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受电视网络影响下的人们会一代一代在审美情趣上不断退化,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少,世俗生活把人变成标准件一样。这种商品竞争条件下的“多数人的暴政”与“物质主义暴政”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全球化,其力量是相当令人担忧的。任何具有超越性的、有创造性的独特的审美,都会在这种“霸权”下被排挤得无踪无影。人类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像“经济动物”的物种。到了今天,我们真可以自问一下,难道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四

为什么人们会放弃常人的追求,而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生活方式与思想?特立独行者,并不是苦行者,而是以苦中有乐者,或根本上就是一个在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自得其乐者,他在精神上完全从世俗追求中解放出来。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精神上的动因或心理因素在支配着一个人去做出不同于常人的选择,而又乐在其中?我想,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浪漫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特立独行者的精神上的支点。

浪漫主义,英文是“Romanticism”。什么叫浪漫主义?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了一个最深刻也最为权威的解释,那就是:当冲破平庸乏味的世俗生活的约束,一个人由于内心的元气得到释放而获得一种权能感,一种自由感,即使遭到大不幸,也会因为享受到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而在所不辞。为了人生的这种高峰体验,哪怕苦一世,也心甘情愿。浪漫主义是对平庸世俗无趣味生活的反向运动。浪漫主义打动人心的理由,就在于人性对平庸的逆反心理,特立独行者,从更深一层看,就是追求人生的浪漫主义价值。在超越功利中获得强烈的人生美感,并经由这

种人生美感而品尝到人生的另一种真实。这是一种摆脱了动物性的精神性的真实。它重审美而轻功利,在超越中获得人生的美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价值态度,能够激发我们人类的超越性,激发我们创造的能力。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的,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我国历史上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

最后,我要说一下,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与追求,对于整个民族与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从物种进化角度而言,基因的突变是物种进化的前提,而特立独行者,就相当于一个物种中最具有突变能力的基因,是众多细胞中最富于变异能力的细胞,一个民族的宏观文化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内部是否具有足够的基因细胞变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宏观的文明与民族进步,需要具有大量的具有变异

的活性能力的微观个体。它们具有比一般细胞更强的试错能力。一个由高度同质化的个体构成的宏观社会,是缺乏变异与演变能力的,也是难以产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一个发人深思的史实是,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前夕跑遍了北京的书铺,居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考世界地理,所以读书人不会有对世界地图的需求,须知这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个由这种高度的同质性的士绅阶层支配的民族所遭遇到的这场甲午战争,不败下来反而才是怪事。

我们常常在议论为什么我们中国至今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这固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启迪。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